

重庆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第十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辑

(总第五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文史资料·第10辑/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621-4136-5

I. 重... II. 重... III. 文史资料—重庆市 IV. K2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3008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重庆文史资料第十辑(总第五十四辑)

主 编 罗茂材

副主编 张正杰 李邦平

杜宝珍 熊少华

责任编辑 钟小族

封面设计 王正端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北碚)

(网址:www.xs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0.5 字数:263千字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1-4136-5

定价:21.00元

目 录

| | |
|----------------------------------|-----------|
| 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 ——回忆四川“萧李廖事件”..... | 廖伯康 (1) |
| 带着“指南针”前行 ——重庆南方集团发展回眸 | 孙甚林 (75) |
| 美心之路 | 夏明宪 (92) |
| 搏击商海西亚路 报国立业赤子心 | 郭君稳 (120) |
| 回首当年学大庆 | 刘集贤 (150) |
| 参加第一次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见闻 | 尼世强 (154) |
| 重钢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前前后后 | 田毅 (156) |
| 建设机床制造厂第一次学大庆片段 | 於福海 (168) |
| 彭咏梧烈士称号事件 | 陈启兵 (179) |
| 寻访外祖父佟麟阁殉难地 | 熊一绋 (188) |
| 王世杰在重庆王家沱探宗访族记 | 曹虎沛 (196) |
| 郭沫若在重庆 | 郭树权 (200) |

| | | |
|------------------------|-----------|-------|
| 郑用之与“抗战电影” | 陈兰荪 孔祥云 | (206) |
| 回忆我的父亲——重庆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邓华益 | 邓安澜 | (220) |
| 煤油大王孙越崎与天府煤矿 | 李莹华 | (226) |
| 重庆烟草行业发展史略 | 龙明桥 | (239) |
| 重庆“史迪威博物馆”见闻 | 陈元洪 | (261) |
| 尼赫鲁访问重庆 | 重庆市档案局、馆编 | (264) |
| 重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北大派 | | |
| ——为刘湘效力“文治”的四位北京大学毕业生 | 钟永毅 | (267) |
| 大坪的牌坊与石碑 | 孟 继 | (279) |
| 老重庆的茶馆 | 杨耀健 | (302) |
| 沧白路市政协驻地沿革 | 孟 继 | (313) |
| 一段不可磨灭的奋斗岁月 | | |
| ——第三党陪都遗址考 | 杨 力 | (318) |

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

——回忆四川“萧李廖事件”^①

廖伯康

“萧李廖事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和“大抓阶级斗争”的背景下，由于当时四川省省委主要领导人坚持“左”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作风，压制党内民主，对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并向中央如实反映四川情况的同志实施打击报复而造成的一桩带来严重政治恶果的事件。这个事件从发生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个人的坎坷在历史的长河里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把往昔的伤痛化为理性的反思，实话实说，从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我们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和执政党自身建设。

一、事情的缘起

面对严重困难，干部忧心忡忡，议论纷纷

事情是从议论当时四川存在的严重现实问题开始，经过几件相互关联的事件逐步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

^① “萧李廖”是三个人名的简称。其中的“萧”是萧泽宽(1917~2003)，重庆解放前川东地下党最后一任特委书记，时任中共四川省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是李止舟(1916~2004)，是抗战时期在南方局和新四军工作过的老同志，解放初曾任青年团重庆市工委书记，时任中共四川省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即本文作者，1924年生，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奉命和一部分同志返渝，主要从事学生运动。时任中共四川省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编者

由于我们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真实情况。

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后，更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高潮，但问题也随即出现。以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大跃进”成了大倒退。当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11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着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错误。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某些“左”的错误。可是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却又把党内要求进一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清理“左”的错误根源的正确意见，视为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将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使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本来已经很沉闷的党内空气，由此愈加窒息。许多人不敢说真话，明哲保身，但求避祸。

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经济上纠“左”的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觉察、有待纠正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再加上部分地区一定程度的自然灾害，造成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异常严重局面，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副产品全面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粮食、副食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危机，许多地方许多人因营养不足而普遍浮肿。面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纠正“五风”（即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五六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

奇同志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引用湖南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中央采取了一些纠“左”措施的情况下，从1961年后全国形势开始好转，而四川却继续实行“左”的政策，困难还在不断发展，属政治、经济重灾区，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浮肿病人多，饿死人多，牲畜死亡多。在这千百万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广大干部忧心如焚，惶惶不安，担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切盼党中央和毛主席能了解下情，进一步采取措施，克服困难。在重庆，我对当时许多干部的心情概括了三句话，叫做“矛盾重重，忧心忡忡，议论纷纷”。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全国所有社队以《十二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纠正“五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重庆市委抽调一批机关干部，组成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团，分别到当时重庆所属的巴县（现巴南区，下同）、綦江、长寿（现长寿区，下同）三个县进行整风整社。萧泽宽是巴县工作团团长，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长，我是市委农村整风整社办公室主任，联系三个工作团。正是这样，我们才真正了解到四川继续实行“左”的政策给农村造成的巨大灾难。

1960年底工作团下去时，农村已被折腾得差不多了，“大办钢铁”、“大修水利”、“大办食堂”造成的破坏历历在目。树几乎砍光了，有的房子也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私人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也搬走了，灶扒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区，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虽比邻近的涪陵地区少，但情况也很严重了。李止舟在长寿工作团的一份简报中写道，有些生产队是“家徒四壁，犹如水洗，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市委书记鲁大东看了这份简报后说写得不错。当时整风整社，是带着抓阶级斗争的框框，将社队分

为三类，重点整落后队。所谓落后，主要是由于贯彻执行“左”的政策扼杀了社员积极性，造成生产落后，生活困难，饿死了人，浮肿病人多。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往往被迫违法乱纪。如由于普遍饿饭，社员出工不出力，有的小拿小摸，干部便对社员实行搜查抄家，乃至捆绑吊打，有的致伤致残，部分干部也有一些多吃多占，组织瞒产私分行为。当时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凡有三类苗，三类队员，必然有三类人”。于是在社队干部中组织批斗、撤职、抄家、抓人，搞得杀气腾腾。后来随着调查了解的深入，李止舟他们发现不能怪社队干部，主要问题是强迫执行上级的“左”倾政策造成的，上级也感到是个问题，所以把被捕的一些人放了，对被整的干部也进行了甄别。

那时巴县的情况稍好一点。说来也极具讽刺意味，其所以稍好一点，主要原因是巴县对上级的瞎指挥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例如省里违反自然规律和群众习惯，硬性规定各地大放冬水田，抢种一季小麦，硬定指标往下压。巴县县委书记周平深知民间疾苦，也懂得政治风险，既不敢硬顶，也不愿照办。便采取多报（数字）少放（冬水田）的办法，结果减少了损失。为了对付高征购，上交的是早、晚稻，多留点“饱水谷子”的中稻，让社员尽可能多吃一点粮食。因此巴县饿死人不多，但患浮肿病的也不少。这点小举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干部、群众普遍呼吁搞包工分成。群众要求不高，只请求在田坎背壁空地上让社员夏天种点豆子、高粱，冬天种点胡豆、豌豆，收获后社员可以分点成。就这样县委领导还有顾虑，怕犯包产到户的错误。萧泽宽说，群众现在没有吃的，搞点包工分成是救命的问题，如果出了事由工作团负责。这种包工分成的办法对救急度荒也起了一点作用。后来批判萧泽宽的“罪状”之一，就是说他搞“三自一包”。

1961年，萧泽宽和李止舟还先后分别到重庆邻近的涪陵专区作过考察，那里的情况比重庆地区更严重。我也到长寿渡舟公社

作过调查了解。有的生产队已经遍地荒凉，满目疮痍，十室九空。大好河山，勤劳人民，解放已经十多年，此时竟连年饥荒，难觅一碗饱饭。“左”倾政策造成的灾难，实在令人震撼，发人深省。严酷的现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逐渐清醒。

从中央七千人大会到重庆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11月16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中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由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干部大会。

1月27日，刘少奇同志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在大会上对他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如对于“三面红旗”，他说：“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再次提出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少奇同志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会议上讲，毛主席建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这个“出气”，就是让大家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1月30日，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

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主席在会上还作了自我批评，并且说，同志们回去后，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要发扬民主，争取主动，作自我批评。

重庆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 49 人，市委负责人去的有第一书记、市长任白戈，书记鲁大东，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中央七千人大会所强调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犹如一阵和煦的春风，对正处于困难时期的全党是个巨大鼓舞。

1962 年 2 月底，重庆召开了有各区县、各部门以及大型厂矿、大专院校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这次全委会是在省委召开传达会议之前先开，有点违反常例。实际上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想通过重庆先开会了解干部情绪，投石问路，摸摸情况。他认为重庆的干部对省委的意见多，有气先在重庆出了，不然到省里开会时对省委压力大。所以尚在北京时就向任白戈交代，重庆要先开会传达，然后省委再开会传达。

如何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市委常委会进行了研究。为了解除大家发言的顾虑，规定小组记录只记事，不记发言人姓名；小组讨论中提倡只谈事不要涉及人，避免追究个人责任。当然，在一个小组内大家都知道是谁发的言。同时，事与人也很难分得开，谈到具体事情很自然会涉及人，但都尽量避免。另外，市委常委会还研究了小组简报如何分发的的问题。过去开大型会议的惯例是小组简报送会议简报组审查修改后再发下去，这次会议为了使大家畅所欲言，规定小组简报由小组自行审查，只要内容符合会上发言的实际，组长签字就行了。各小组的简报要不要下发？常委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最后任白戈作结论说，还是按照七千人大会的办法，各小组的简报都下发交流。为了将七千人大会精神全面带回各个单位，常委会决定仍仿照中央的办法，每个单位来两个人，以免回去传达走样。会上还决定对 1958 年以来市委所发的有

关政策规定、指示和重要会议记录等，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和清理，以便更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我是办公厅副主任，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后来批判我时这也成了一条罪状。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民主，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虽然会议没有为彭德怀等同志平反，没能彻底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反右倾”的“左”倾错误，但参加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的同志听了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传达后，仍然感到心里亮堂，心情舒畅，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希望。在这种气氛影响下，再加上市委对会议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发扬民主的措施，这次会议一开始就比较活跃，发言踊跃。大家认为几年来工作中的成绩很大，同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才换得如此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必须认真地总结，并切实贯彻到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去。在小组讨论中大都联系重庆和四川的实际情况，对省、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尤其是对省委特别是对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意见比较集中，有些话也讲得很坦诚尖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当时全省形势如何估计和省委是否认真贯彻了中央方针政策的问题，这是会议初期各个小组普遍提出的一个问题。很多同志问，全省一百七十多个县，就有五十多个“落后县”，省委对此如何估计？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农林牧副渔业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全省这几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情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反映？有的同志指出，省委提出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量调出粮食支援全国，但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群众观点应该是一致的，从六亿人民出发和对四川七千万人民负责也应该是一致的，而省委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片面性，突出反映在粮食问题上。四川口粮标准在全国最低，浮肿病人多，死人严重，

与省委提出要发扬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风格”有直接关系。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尖锐指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省委对大批死人现象遮遮掩掩，措施无力，这着实令人吃惊，不知还有没有群众观点？

不少同志在会上提出，四川向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而现在的困难却比全国其他许多省都严重。究其原因，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人祸是主要的，省委应作出结论。四川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究竟是多少开，省委应该有个交代。有的不同意省委一再强调成绩与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有的认为四川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不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能框得住的，造成四川严重困难的原因不能只说天灾，而主要是人祸，应该着重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四川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今天对当时所提这一方面的意见应该作一点分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根本问题出在中央，三面红旗本身就是“左”的产物，各地贯彻执行起来无不产生严重后果。但当时我们这些人中，在参加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中，谁也不曾也不敢直接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有问题。另一方面，当时四川确实推行“左”的东西比较突出，并且还有创造发挥。同时，中央在对某些政策作了有限度的但也是重要的调整以后，四川却对调整的一些政策措施或执行不力，或拖住不办。大家的意见主要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言。不少同志讲，这些年省委主要领导人很少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就积极传达贯彻，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强调要结合本省实际。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不让下级知道。贯彻执行中央指示要结合本地实际当然是对的，但当时四川的所谓“结合”就是向“左”靠，越“结合”越“左”，越脱离实际。基层干部反映，每逢听到中央的指示后都精神振奋，听到说四川情况特殊后就冷了半截。有的说，四川出了

“贪污分子”，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贪污”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一斗，到省委只有八升，有的地方层层克扣，越往下剩得越少。同时也批评市委在接受省委制定的政策任务时，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敢如实反映情况。

对于省委工作中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有些同志直言不讳地说，四川的问题是“左”，以“左”比右好的指导思想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宣传文教小组的同志说，几年来四川的问题是死抱“左”的东西不丢，以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种思想在四川影响很深，在干部思想上扎了根，大家都怕犯右不怕犯“左”。

第二方面的意见，是认为省委脱离实际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对干部实行过火斗争，搞得干部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当时大家认为，省委抓阶级斗争还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强调过分。表现在轻易把一些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原则上去解决，运动不断。如从1959年至1960年，在工农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效果不好。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把主要锋芒引向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实际影响了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改造落后队工作中，省委认为70%是阶级问题，对基层干部“五撤三、三撤二”。1961年在全省又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搞得人人紧张。省委提出“贯彻执行总路线要以反右倾斗争为纲”，搞“火线反右倾”、“火线整风”，“哪里生产上不去，就在哪里反右倾”。结果弄虚作假的干部受表扬，讲真话办实事的人受处分。而且要斗哪个干部，就要斗臭、斗透、斗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在农村中，对大队、生产队不脱产的群众干部大搞抄家、赔退、抓人。群众说“当干部的没有好下场，鼓掌上台，捆绑下台”。搞得不仅农村社员视当干部为畏途，连家属也不让亲人当干部，怕犯错误牵连全家。党内过火的斗争，伤了一些人的感情，破坏了民主原

则，窒息了党内民主空气，滋长了命令主义，造成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上下级关系紧张。

对于当时为了纠正反右倾斗争扩大化而正在进行的甄别工作，不少同志提出邓自力 and 安以文的问题。邓自力是原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面对农村严重饥荒，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敢于从实际出发，在全省率先解散公共食堂，给社员划自留地，规定自留地要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数量，同时在一些生产队搞包工包产试点。这些措施调动了社员积极性，对促进生产解决农民生活困难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地农村社员称他为“邓青天”。可是在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区却被省委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邓自力被定为四川“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地委书记职务，下放农村劳动。1961年，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批判邓自力的几个问题全错了。可是省委仍以他有包产到户的错误的为由，在甄别时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改为“犯了右倾错误”，由地委书记降为地委副书记，同时下放长宁县任县委副书记。安以文是重庆钢铁厂党委书记，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定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撤销党委书记职务，放到下属的103厂任厂长。他的所谓错误是：(1)1956年公开赞成反冒进；(2)在讨论制定1958年“大跃进”计划中，连续11次修改降低指标；(3)认为1958年四季度太紧张，主张1959年一季度要进行休整。安以文的上述观点和做法符合当时实际，是正确的。但在1961年甄别时，仍说他“犯有政治上右倾动摇和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动摇了军心，瓦解了士气”，不再适宜担任党委书记工作，改任党委副书记。两个人都留了不该留的尾巴。参加全委扩大会的许多同志都认为，省委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和纠正错误的勇气。如果对错误处理的干部甄别不彻底，就不能解除干部的思想顾虑，不能真正做到畅所欲言。要求省委通过甄别工作，从政

策上体现说老实话的人不吃亏，让干部敢说老实话。

宣传文教小组在讨论中还提出，省委有的负责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有片面性，说知识是从实践斗争中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未参加革命，也未参加实践，有什么知识？知识分子翘尾巴，就要把他们搞臭，要挖祖坟，要插红旗、拔白旗。希望省委改正这种错误观点，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第三方面的意见，是认为省委领导缺乏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不少同志针对当时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提意见说，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毫不介意。但1957年以后就一天天不同了，各种政治运动整了许多人，大家有了“经验”，变得有的驯服，有的油滑，有的沉默。不少人总是揣摩着领导的心理和需要来表态行事，党内党外都是如此。即使在党委会上讨论工作也要看一把手脸色行事，不能说不同的意见，不能商量问题，一把手说了算。如此上行下效，在“一言堂”的情况下，谁提了不同意见，搞不好就被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结果造成党内不敢说真话，只能说成绩，不能说缺点；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使得领导很难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和群众真实心态。

有的同志提出，省委从未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作过自我批评。省委对中央要求民主，强调因地制宜；对下面则要求集中，强调服从照办，有时到了违背常识、不近情理的地步。在“大跃进”中，省委提出全省要“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对不同意见，动辄扣帽子，使干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十八次全委扩大会对省委领导的意见提得多、提得尖锐，后来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时便把账算在我们头上，说是在会议内外刮起了一股反对党的歪风。其实，萧泽宽、李止舟和我都分在党群小组，我们几个在小组会上发言并不多，原因是我们知道内情较多，有意让大家多谈。我们即使发言也没有长篇大论，比较简短，有时是对其他同志的发言作点插话补充，属于三言两语。但意见倾向

明确，毫不含糊。有一次任白戈到党群组听意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发言，李止舟很气愤，站起来插话说：“我也想通了，有些人就是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们这些人算个什么，你说他听不听？”李止舟这个话是针对省委主要领导人，话不长，却语惊四座，任白戈当时也没表态。这句话在后来批判我们时被发掘出来，说我们专门画龙点睛。

我在这次会上的几次发言中，先后主要谈了五条意见。

第一条是水利方针问题。我认为，四川把中央提出的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以蓄为主改为机械提灌为主，结果把原有的小型水塘、堤坝、沟渠等水利设施弃而不用，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瞎指挥。

第二条意见是说，现在对搞高估产高指标大家都有共识了，但引起高估产高指标的思想方法却没有得到解决。我说，过去几年用很多特殊条件创造了一些“典型”，然后根据这些“典型”进行推算，并把推算出来的指标拿到群众大会上去打擂比武，结果越轰越高，这就是高估产的思想方法。

第三条意见是说，1961年底省委在成都召开了一个会，布置在群众中搞“新三反”（反分散主义、反投机倒把、反贪污盗窃）运动，实际是搞反瞒产私分。当时中央不准搞反瞒产私分，而四川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情况不只我一个谈，我的主要问题是最后说了一句“真是祸国殃民”。使用这样尖锐的语言当然更是“大逆不道”了。

第四条意见是说，1960年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再搞什么全民运动了，四川比人家慢半拍，还在大搞“全民运动”。仅1960年一年，重庆就搞了三十三个中心运动或全民运动，像种南瓜与泡咸菜这些群众的家务事都搞全民运动。

第五条是说，四川的问题究竟是“左”还是右，或者是时“左”时右。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是谈右色变，谈“左”泰然。中央精神主要是纠“左”防右，可实际上大家是怕犯右不怕犯“左”。